

# 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廣州

黃海妍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北端，是廣東省的省會所在地。自秦漢以來，廣州一直是嶺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中國海路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由於廣州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在海內外貿易上的特殊地位，一向是外來文化傳入中國的前緣。

早期外來文化的傳入以宗教為主。不少傳教士與客商一道來到廣州，進行傳教活動。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禪宗的始祖，著名印度僧人菩提達摩，在廣州登陸並開展傳教活動，他登陸的地方被命名為「西來初地」，建有華林寺。到了唐代，伊斯蘭教傳教士和阿拉伯商人一起在廣州興建了中國最早的清真寺——懷聖寺，以此傳播伊斯蘭教。此外，祭祀海神的南海神廟中奉祀的印度商人達奚；以及華林寺後來興建的五百羅漢堂中，有意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元朝時來到中國）的塑像（作為五百羅漢之一），都說明了外來文化在廣州的影響力。

隨着廣州在乾隆22年（1757）成為全國唯一通商口岸，對外貿易空前繁榮，廣州也成為西學東漸的要衝。廣州的每一個角落，廣州人生活的每一個部分，都有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子。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廣州的各類建築，從廣州的方言和戲劇，從保存下來的外銷畫和外銷瓷器，乃至民間使用的家具及各種裝飾，看到西方文化在廣州的深遠影響。在廣州，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是水乳交融的。

現存廣州的各類建築，是中西文化融匯的典型體現。這些建築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整個建築風格上採用西方的建築形式，這其中又包括由西方人設計建造的純粹的西式建築，例如沙面舊英法租界區裏的許多歐式建築。還有嶺南大學馬丁堂（現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由美國紐約斯托頓事務所設計，於1905年建成，其平面為地道的「殖民地式」，即在主要使用房間的周圍以柱廊形式將其圍合，是中國最早的一棟鋼筋混凝土建築。（《廣州

文物志》頁180）

又如廣東郵務管理局大樓，位於廣州沿江西路，請英國人設計，建成於1916年，是廣州近代較有代表性的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廣州文物志》頁171）另外，粵海關大樓，現為廣州海關大樓，俗稱「大鐘樓」，位於沿江西路，英國建築師設計，1916年落成，也是近代流傳到廣州的歐洲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典型。（《廣州文物志》頁171）

再就是由中國人設計的仿西式風格的建築。如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墓園，是一座由留美建築師設計的富有羅馬建築特色的陵園。（《廣州文物志》頁253）又如廣州東山和西關的不少西式小洋樓，是晚清及民國時期廣州熱衷洋務的銀行買辦、達官貴人以及歸國華僑為自己建立的居所，這些小洋樓的廊柱、陽台、欄杆都是希臘或羅馬的風格。如位於廣州西關逢源北街的陳廉伯（沙面匯豐銀行買辦）公館，就是一座西洋別墅式三層洋樓。

第二類是糅合中西風格的建築，也可以說西式建築到廣州發生了演變。這類建築多建於20至30年代，在廣州最為典型和常見，反映了我國建築師早期的建築設計風格和手法，一方面因為受到西方正宗建築學院派的教育，具有設計手法新穎、思想開放的特點；同時又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仍然保留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就是其中之一，它建成於1935年，為廣州留美建築師設計，仿西方風格的凱旋門式拱門和自由女神像以及體現中國傳統風格的松鶴、福壽、祥雲等具有濃厚民間特色的紋飾，使這座建築兼具了西方古典形式以及中國傳統的民間藝術風格。（見黃佩賢：《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修建紀略》，《羊城文物博物館研究》頁184-189）

另外是現在廣州舊城區仍然能看到的騎樓建築。「騎樓」是在樓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在馬路邊相互連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長廊。它最早盛行於南歐、地中海一帶，本世紀初廣州開闢馬路時，在多處地方建起了這種可以避風雨、防日曬，特別適應

南方潮濕多雨氣候的騎樓建築。(見《名城廣州常識》頁31-32)它融匯了中西方建築文化，既在二樓以上採用西方古典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又受到中國傳統建築裝飾及風水學的影響。在廣州西關很多騎樓上繪有蝙蝠、如意等紋飾，象徵福到盈門，如意吉祥；而在一些騎樓的頂層裝有石獅子面向馬路，符合傳統風水學中以獅子辟邪除魔的理論。

除了在建築風格上模仿西方建築外，廣州傳統的建築中亦隨處可見西方的建築裝飾和技術。被譽為「嶺南建築藝術明珠」的陳氏書院(俗稱陳家祠)，是一座典型的嶺南祠堂建築，以各種建築裝飾而聞名。在這些傳統的建築裝飾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西式建築裝飾和技術的痕跡，例如磚雕中小天使的運用；還有月台上的鐵鑄欄板，在材料上引入西方的鐵鑄裝飾技術，在內容上卻全部是中國傳統的神話故事和傳說，如「金玉滿堂」圖、「麒麟鳳凰玉書」圖和「三羊啟泰」等等。至於傳統西關大屋中常見的套色蝕花玻璃窗裝飾，其蝕刻技術也是從西方引入的，但蝕花玻璃的內容卻十分傳統，如牡丹、梅花等圖案及一些傳統的中國山水畫等。在這裏，中西文化的融匯又一次得到了具體的反映。與建築相配套的家具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清代以後，隨着廣州海外貿易不斷發展，廣東酸枝家具的形式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藝術的精華，把中國傳統家具嚴謹、肅穆的藝術造型與西方傳入的各種家具形式結合起來，創造出線條流暢和諧，花樣多變的「廣式家具」。「廣式」家具的形成始於國外來料加工的「洋裝」家具的大量製造，之後各種洋人使用的西式家具式樣也很快在廣州流行，仿西式的家具隨之暢銷起來，成為許多家庭的常用器具。

除仿造西式家具外，廣州匠師更採取中西結合的辦法，以中國傳統家具基本結構為基礎，參照西歐家具的新穎樣式以及在雕刻上的細膩裝飾，造出款式別緻的家具。至於家具上的雕刻紋飾，則既有反映中國傳統民間風俗文化的吉祥圖案，又有一些從西方傳入的洋花圖案。(見蔡易安《清代廣式家具》頁31, 65-68)

事實上，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除了建築和家具，一些工藝品的製作以及繪畫技術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這其中包括自鳴鐘、

外銷瓷和外銷畫。清代廣州製造的音樂自鳴鐘和「洋」彩瓷，開始是外國來樣訂造的，不論造型或紋飾和西方製造的洋鐘、洋彩瓷沒有差別，到後來才被廣州工匠加以改良和創造發展。現藏廣州博物館的鎏金自鳴鐘，製造於清乾隆年間，就是清代廣州工匠仿照進口自鳴鐘的原理加以創造發展而成的。

而外銷的彩瓷，原料是購自江西景德鎮的白瓷，最初採用西方傳入的珐琅彩料，仿照西洋的畫法，其繪畫的內容迎合了當時西方人的要求，有西洋帆船、歐洲城堡、中世紀人物、禮拜堂、花園風景等，甚至是按照西洋名畫彩繪的。之後，外銷瓷的製作走上了中西合璧的道路，逐漸形成了現在所稱的廣彩。在彩繪技法上，一方面採用傳統的彩繪技法和工筆國畫的筆法，另一方面則是吸收、模仿西洋油畫、鋼筆畫的技法。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外銷瓷發展起來的廣彩到了成熟階段，大量銷往歐洲、美洲和東南亞，沙面租界的洋行以及廣州商人建立的瓷莊專門經營廣彩的外銷。

廣州外銷畫的出現也是如此。西方畫家的到來和西方油畫的進口，為廣州的畫人開闢了新的視野，他們很早就知道，在中國的卷軸丹青之外，還有油畫、水彩畫和水粉畫。他們或直接或間接跟從西方畫家學習，不同程度地掌握了西畫的技法，從18世紀中葉開始，廣州已有相當數量的職業畫師在繪製西畫了，他們以西畫的材料，以西式的構圖，採用西畫的透視、明暗等技法，表現立體的景物。但在表現遠近空間時，仍有平板的感覺；在處理山石樹木、亭臺屋宇和船舶時，不時露出中國傳統繪畫的痕跡。不過在繪畫題材上，則一反中國早期西畫那種以西方的聖像和中國的皇族為內容的宗教氣息和宮廷氣息，把油畫創作的範圍推到廣闊的世俗社會中去，以中國民間古老的生活風情和沿海商埠新奇的景象為繪畫的主要內容，表現了清代中葉廣州的社會風貌。外銷畫在廣州盛極一時，至19世紀50年代後才衰落下去。(陳澄：《清代廣州的外銷畫》，《羊城文物博物研究》頁369, 372, 378)

在廣州的語言和戲劇中也可以找尋到西方文化影響的痕跡。在語言方面，廣州口岸在早期的對外交往中產生了「廣東英語」。「廣東英語」專指在

廣州的中國人與「西洋人」之間用作進行商業交易和往來媒介的獨特語言。它巧妙地運用聽慣了的外國音調，以發音相近的廣州話來表達，既沒有句法，又沒有邏輯聯繫，但卻成功地達到了讓廣州人與「西洋人」交流的目的。（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頁44-47，「廣東英語」）在今天的廣州話中，仍有許多借詞的發音來自早期的「廣東英語」。例如摩登——modern，泵——pump，啤酒——beer，恤衫——shirt，菲林——film等。

在廣州西學東漸風氣的影響下，傳統的地方劇種粵劇也受到了西方話劇的影響，在二、三十年代（1926-1936）進行了改良。在樂器方面，引入梵啞鈴（小提琴）、色士風、鋼琴等作伴奏。服裝方面，梨園名角競相採用從歐美引入的膠片；燈光採用電影和西洋戲劇用的水銀燈，並學習話劇的佈景方法。（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廣東省戲劇研究室編：《粵劇研究資料選》廣東戲劇研究室，1983年）

綜上所述，廣州對於西方文化的吸收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由開始的生搬硬套，到後來吸收西方先進的技法，再結合中國的傳統加以改造。可以說，幾乎每一件在廣州出現過的西方事物和技術，都被廣州人加以吸收和改造過，說明廣州人十分善於學習和西方有關的人和事，並善於不拘一格，融匯中西。廣州對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吸納過程也是持續不斷的，即使在鴉片戰爭後實行五口通商，廣州失去了在對外貿易上的優越地位以後，這種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也從來沒有停頓過，二、三十年代在廣州出現的中西合璧的建築以及粵劇的改良，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同時，在廣州形成的融匯中西的文化，對於中國沿海和內地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有眾多廣州商人移居的上海和香港。例如一度盛行於上海外國商館區和租界的所謂「洋涇濱英語」，實際上完全是「廣東英語」的翻版。

---

## Villagers' Community, Scholars' Community: An Outsider's View

Beatrice G. Faure

*(A four-day workshop co-organized by Xiamen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was held in Fujian from 11 to 14 July, 1997. Participants visited villages and temples in Fuzhou and Putian regions in the daytime and had round-table discussions in the evening. The following is written by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Beatrice, G. Faure, who is beginning First Year in Social Anthropology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is summer I saw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 had been on short trips before, but had always been occupied by the standards of hygiene, the food, or the comforts more than truly attempting to see the world beyond my well-being, and look at the ways of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Of course, the China I saw was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whole country, as we visited a few locations in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 of Fujian. However, what I saw was deeply fascinating, and, to an "outsider" in every way, it was a definite eye-opener.

I was an "outsider"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Being the only "youngster" amongst a group of scholars,

I was completely ignorant of their ways of thinking, observation, interests and points of view. I felt very much a "foreigner" in such an alien country, I was unfamiliar with everything from the food we were served in restaurants, to the ways of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Hence this is an article not only about the ways of life in the villages that I found interesting, but also of the practices of the scholars on the same trip.

The first interesting thing I found whilst we were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s, was that the temples are not simply buildings that hold records of the past, but are in fact, places of importance even in daily life today. From